

如何建设“心灵盲道”？ ——基于 Y 市视障用户的媒介使用分析

黄建东，崔 波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无障碍建设经历传统社会到信息社会变迁，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无障碍社会发展可观，由此产生从社会到学界对信息无障碍的关注。但目前学界对信息无障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技术中心范式，信息无障碍研究辐射出的在残障用户效果上的研究也显得严重不足，因此难以回答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该研究从“无障碍传播”这一理论视角出发，了解视障用户使用媒介的动机，进而分析视障用户在媒介使用后的主观获得感。研究发现：无障碍信息服务模式单一、手机内置无障碍建设的缺失、滞后的无障碍电影创作和匮乏的特殊教育成为现阶段无障碍传播建设的突出问题。文章也提出了无障碍传播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无障碍传播；口述影像；视听障碍者；数字残疾沟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1) 02-0010-08

从国际社会到中国国内，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残疾人事务是一个人权问题，保障残疾人能和健全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社会生活和发展，已经令各国达成共识。中国是世界上残疾人最多的国家，其中视力残疾约 1233 万人，听力残疾约 2004 万人。2019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70 年》白皮书指出：“关心特殊困难群体，尊重残疾人意愿，保障残疾人权利，注重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推动残疾人真正成为权利主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享有者。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满足残障人群“社会化”的过程中，政策为保障兜底，技术则成为加持器，而如何真正打破无障碍建设的“障碍”，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主题。

“无障碍”一词来自“barrier free”或“accessibility”，表示生活中没有阻碍地顺利进行各项活动。无障碍理念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由丹麦人卜麦克逊（N. E. Bank-Mikkelsen）提出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原则，该原则提倡残障人能够和健全人享受同等待遇生活和教育条件。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无障碍一词被赋予“信息无障碍”的理念，信息无障碍（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指出了“无障碍”理念在信息社会被赋予的新内涵，即人人都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红利。信息无障碍主要的关注点被定位在如何改进技术，并在技术层面改善社会中的障碍“设施”。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信息技术的“可及性”来开展研究，但技术的“可及”并不意味着传播“通畅”，^[1]于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发展出了“无障碍传播”这一研究理论。

“无障碍传播”是指要扫除信息传播中的一切障碍，实现信息平等地“到达人人”的过程，强调无障碍传播的“终点”。将其置于残障者层面，狭义上专指有关残障者的信息传播障碍问题。“传播无障

基金项目：2020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无障碍影像——通往心灵的‘文化盲道’”（2020R416032）；浙江传媒学院 2019 年度新闻传播研究院指导专项课题（XCZD1901）。

作者简介：黄建东，男，硕士研究生；崔波，女，教授，博士。

碍”强调信息传送的动态过程、用户的主动性、传播过程的交互性以及传播活动的社会性等,使得无障碍传播成为一个包含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信息接收者及传播制度环境等诸多要素的理论研究领域。^[2]遵从这一理论背景,本文试图从实践层面继续审视技术,需要解答的问题是:技术之后视障用户的大众媒介使用状况如何?现存的技术是否提升了视障群体的主观获得感?在科技之后,无障碍传播受阻,又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解决?

正如我们所见,互联网的兴起让技术更大造福残障者,视障者也试图在互联网中弥补自身与健全人之间的生理“鸿沟”,但与健全人在互联网的表现不同,视障者在媒介使用中属于“被动”状态,更多扮演着“接收者”的身份,极少参与媒体互动。^[3]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线上和线下的传输设备为残障用户解决了视听符号互换的技术支持,但技术的更迭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带给视障用户同健全人同价的回馈,用澳大利亚学者 Gerard Goggin 和 Christopher Newell 的话来说,“虽然互联网给许多残疾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但他们也一直被牢牢地留在网上的边缘,或者只是离开‘网下’”^[4]。在试图通过“补偿”使残疾正常化的过程中,技术也再现了“能”和“不能”的区别。^[5]

在笔者制作无障碍电影的经历中^①,接触到许多视听障人群。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发现无论是青年或上了年纪的中年群体,视力和听力的障碍都没有阻挡他们对社会交往的期待。在与助残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多次交谈过程中,她反复强调残障用户对使用无障碍设备的强烈需求,“能用的信息设施就用,不能用的我们就调动各种关系去争取”^②。

信息社会的到来无论给健全人还是残障人都带来了技术上的支撑,专注技术无法为“人”的生存追根,于是笔者转换视角,立于“人”,摒弃“他者”的二元观念,关注人的满足,进而反思信息社会无障碍传播的缺口与不足,试图阐释无障碍社会的信息传播建设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的出路。

一、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 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的调查地点是浙江省下属的县级市 Y 市。Y 市经济发达,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根据 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2019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 142.85 万人。^[6]根据该市残联的备案数据,Y 市目前持证残疾人 24601 人,其中视障人士 1107 人,听障人士 6683 人。在大力扶持残疾人的时代背景下,Y 市长期致力于开展无障碍环境设施的建设并具有突出成绩,如小区各出口设有无障碍通道,车站、图书馆、剧院等公共建筑出口有无障碍坡道,出入口增设安全扶手等。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新媒体广泛渗透到残障人士的生活中,影响并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但观察发现,作为县城的 Y 市在无障碍传播的建设上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二) 样本选择

在关注到 Y 市存在的问题后,笔者与当地的残疾人联合会负责人取得联系,并在他们的介绍下接触到该市的数位视障人士。考虑到视障群体的生理条件,问卷调查主要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于是在 2020 年 3 月初至 5 月间,笔者逐步开展问卷调查与网络访谈。问卷调查的样本主要通过该市残疾人联合会及助残志愿者协会的推荐与相互介绍的方式持续获得,视障群体的访谈对象主要考虑样本的视力情况及具有代表性身份,另外还访谈了 Y 市残联组宣部主任与助残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在 Y 市共收集有效问卷 164 份,深度访谈主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行。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如表 1 的统计。

① 笔者受口述影像研究启发,开始制作无障碍电影,尽绵薄之力。

② 访谈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8 日。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统计

姓 名	性别	年 龄	职 业	备 注
于师傅	男	40 岁	按摩师	中专，先天低视力
郑 某	女	35 岁左右	按摩师	Y 市盲协主席，本科，全盲
金 某	男	约 30 岁	学生	在美留学，法学博士生，后天低视力
朱 某	男	32 岁	心理咨询师	全盲
Peter	男	40 多岁	按摩师	全盲
陈 某	女	35 岁左右	事业单位	Y 市残联组宣部主任
英 子	女	30 岁左右	志愿者协会	助残志愿者协会负责人

二、视障用户媒介使用存在的问题与瓶颈

技术的突破为视障用户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平台，他们不再被动地接收外界的消息，愿意主动在互联网摄取信息，其“受者”的角色逐渐在科技的冲击下转变为“传受一体”的用户。调查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视力残障者使用移动设备及互联网，但碍于当前种种实施方案过于单薄，信息无障碍建设无法破除无障碍传播的“障碍”，持续时间不稳定导致残障者收益微薄。此外，信息设施建设“他者”观念浓厚，并未真正触及视障人群的主体需求，最终演化为残障人群与健全者之间明显的权利区隔。

（一）多元媒介使用动机与单一互联网服务之间的矛盾

在对使用电脑频率的调查中，42.68%的视障人群选择“基本不用电脑”，使用电脑小于3小时的视障人群占比39.02%（见表2）。笔者通过访谈得知，视障人群对于使用电脑并没有强烈的需求，主要原因在于，目前针对视障人群的无障碍网站建设局限于政府开发的公共网站，可供残障人士选择的其他机会几乎为零。另外，对设备操作的陌生也成为阻碍视障群体参与电脑使用的极大因素。

表 2 视障用户使用电脑频率（N=164）

使用电脑的频率	频数（人）	占比（%）
每天 6 小时以上	14	8.54
每天 3-6 小时	16	9.76
每天 1-3 小时	33	20.12
每天 1 小时以下	31	18.90
基本不用	70	42.68

随着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互联网普及率大大提升，根据 CNNIC 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站总数达 4800 万个，网民规模达 8.54 亿。^[7]如此庞大的网站数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存在无障碍设置的网站仅以政府的公务网站和数字公共图书馆为主。调查中关于使用电脑的用途如表 3 所示，选项较为集中的为“学习知识技能”（49.39%）、“获取新闻资讯”（39.02%）、“了解外界环境”（38.41%）、“查找资料”（36.59%）和“娱乐消遣”（35.37%）。由此可见，在视障群体的媒介使用中，也存在对媒介的需求甚至是依赖现象。梅尔文·德弗勒（Melvin L. DeFleur）和鲍尔-基洛奇（Sandra Ball-Rokeach）在 1976 年提出的“媒介依赖理论”

认为, 受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 进而有学者指出受众对媒介的依赖并非仅限于工具性目的, 也可能是仪式性的目的。^[8]而本文通过对视障群体的研究发现, 视障媒介使用者同时具有“仪式性”和“工具性”的动机, 且“工具性”使用动机较为强烈。但较低的电脑使用频率也折射出单一的无障碍网站服务无法满足视障人群对媒介的追求, 许多网站的开发仍旧缺乏对视障人群的便利服务。

表 3 视障用户使用电脑动机 (N=164)

使用电脑的用途	频次 (人)	占比 (%)
获取新闻资讯	64	39.02
学习知识技能	81	49.39
娱乐消遣	58	35.37
了解外界环境	63	38.41
消除孤独感	39	23.78
查找资料	60	36.59
其他	42	25.61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 国内目前没有网站无障碍建设的一个强制的法律法规, 这也就无法建成规范化和细致化的无障碍通行设施; 其次, 网站的开发者没有意识到用户当中存在视听障碍的群体存在, 绝大多数的网站或 APP, 并没有作无障碍方面的考虑, “例如很多网站登录需要验证码, 但是验证码需要拖动滑块, 这对于视障群体来说是非常不便的。再比如网页中的一些广告弹窗, 读屏软件根本无法识别, 导致我们在网页端试图互动的意图消磨殆尽”^①。对于很多残障用户来说, 浏览网页很多时候都是要靠运气, 读屏软件能够识别的网站就用, 不能识别就放弃。故此, 如何在多元复合的社会中, 明确对“边缘”群体的责任义务, 是政策法规和社会建设亟需共同关注的。

(二) 高频度的手机使用与缺失的助残应用之间的矛盾

问卷调查表 4 显示, 经常使用的媒体为“手机”的占比 63.41%, 这也充分显示新媒体时代视障用户对手机使用的强烈需求。其次就是“电视”(43.29%) 这一传统媒体的使用, 残障用户尤其是视障群体碍于视力的缺陷, 他们更愿意通过听觉系统来接收外界信息, 这也证明了电视仍有在视障用户中存在的价值。

表 4 视障用户经常使用的媒体类型 (N=164)

类型	电视	收音机	DVD/VCD	报刊	手机	互联网	电影	其他
数量 (人)	71	56	15	22	104	52	30	7
占比 (%)	43.29	34.15	9.15	13.41	63.41	31.71	18.29	4.27

此外, 对于手机使用的满意度调查, 笔者提出“你认为目前手机的无障碍建设满足你的需求吗”的问题, 如图 5 所示, 14 人表示“完全满足”(8.54%), 82 人表示“基本满足”(50%), 25.61% 的用户表示“不太能满足”, 另有 10.37% 的用户选择“完全不能满足”, 由此可以看出移动设备在视障人群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且无障碍建设的可观程度。

^① 访谈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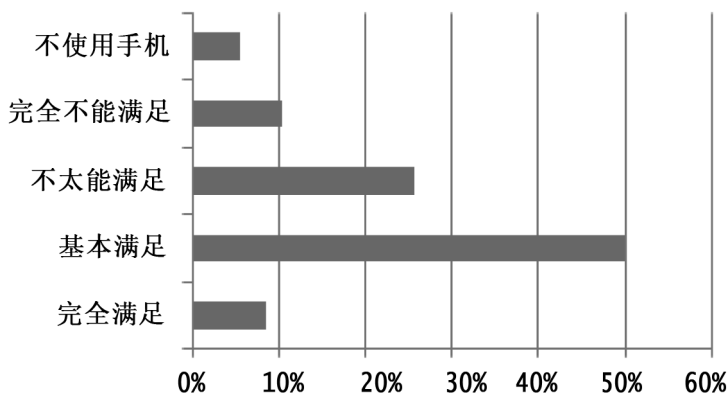


图 1 视障用户使用手机满意度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在当前助残的政策和文明社会关怀下,从政府到企业都广泛关注残疾人服务的设置,尤其是手机端的配置,但同样会出现供需不相符的尴尬局面。如,美团为助残单独开发的无障碍版本,花费大量成本,试图通过内选主题的扩大或语音点单辅助视障人士点餐或其他操作,但就目前来看效果不佳。“每个页面都只有一个主题,对于低视力的群体来说,操作太繁琐了,我宁愿用普通人的那一个版本。”(Y市盲协主席,本科,全盲)^①这与无障碍建设的视角出现偏差有很大的联系,缺乏残障人士参与制作的产品隐含在“他者”的视域下,信息建设者多以健全人的角度为残障人士思考,因此无法在产品开发和细节创作上有切身体会,这就容易出现美团开发无障碍版本的“乌龙”。另外,手机设备的系统建构缺乏包容性,“各自为政”的手机系统设置出现软件之间不兼容的弊端。助残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告诉笔者,现有的智能手机可以安装读屏软件或自带读屏软件(如Apple),可以有效捕捉屏幕的内容,普通的软件都可以正常读取,但不幸的是,许多手机各有其支持的系统,导致软件与系统间无法兼容,最终导致读屏软件识别不了而影响残障人士的使用。

(三) 较强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拖延症”无障碍电影之间的矛盾

无障碍电影主要是针对观看电影有障碍的群体,通过增加解说、字幕和手语等方式,经过技术合成,制作成供视听障碍人群观赏的电影。^[9]在笔者的调查中(N=164),视障用户“经常看”电影的比例占比12.20%，“偶尔看”电影的占比70.73%，有17.07%的视障人士表示“从不看”电影，可以看出，对于视障人士来说，他们对看电影还是有需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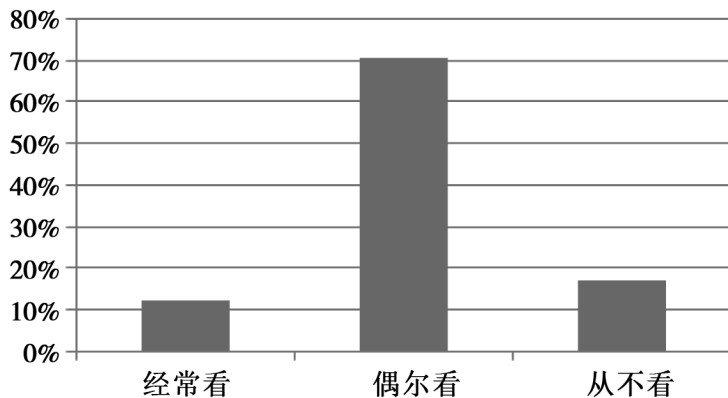


图 2 视障用户看电影频次

为了获知视障用户对无障碍电影的了解程度,笔者进而将提问设置为“你了解无障碍电影吗”,有

^① 访谈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

12.20%的用户表示非常了解,34.15%的用户选择比较了解,71人(占比43.29%)选择不太了解,共17人(10.37%)表示不了解无障碍电影甚至未曾听说过。笔者了解到,视障群体会通过手机“看”电影,但就此次的调研来看,多数视障用户也许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完整”的一部电影。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导演贾樟柯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议案》,建议国家为无障碍电影立法、建设无障碍电影标准、减少对于无障碍电影的版权限制、完善电影院的无障碍观影设施,号召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无障碍电影。这一倡议开始让业界关注无障碍电影的发展,但无障碍电影制作标准未统一,且缺乏专业的无障碍电影制作人才,导致无障碍电影的制作成果参差不齐,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一部电影成果的输出效果和质量。此外,无障碍电影制作的滞后性使得视障人群总有落于人后的失落感。一位盲人按摩师(中专,低视力)告诉笔者:“我们当然有兴趣看电影,但是每次一部新的电影都是等其他人看完,好久之后无障碍版本才能出来,慢慢地兴致也就磨没了。”^①

值得关注的是,无障碍电影目前主要还是以网页的方式为视听障人士呈现,与此形成对比是,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银幕数为55623块,但为残障人士提供的无障碍影院却寥寥无几。现有建设的“无障碍影院”主要是租借其他场地来进行无障碍电影的播放,如残联提供的场地、图书馆报告厅等,对残障者来说毫无临场感可言。

(四) 较高壁垒的技术选择与短缺的特殊教育之间的矛盾

信息技术的建设为残障人士的出行和生活增添动力,这仅是对健全人来说。对视障人士来说,操作技术的瓶颈时常使他们打消对电脑或移动端设备的使用念头,视力的缺失使他们理解事物十分困难,因此如何切实眷顾视障人群,是技术可及之后需要继续思考的,而教育作为视听障碍者先期的素养培育措施,成为重要的一环,也是弥合技术的重要手段。问卷调查显示,视障用户主要的学历都在“大专”以下(总占比96.96%),其中“小学及以下”占14.02%，“初中”占35.98%，“高中或中专”占34.76%，“大专”占12.20%，“本科”占3.05%，调查问卷中无“硕博研究生”学历。可见当下视障用户受教育水平的不足。

通过助残组织负责人的介绍,笔者认识了一位目前在美国深造的法律博士生(后天低视力)。在与他的对话中,他表达了对国内特殊教育的看法,也进一步证实了为何在视障人群中,学历整体偏低的现象:“其实现在在国内的特殊教育是一种隔离式的、强制的特殊教育。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中度的障碍者,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了,只能进入特殊教育的体系。这种特殊教育的体系,是和主流社会完全脱节的。然后都是做一个定向的职业培训,比如说盲人按摩,或者说聋人去做设计。而并不是从这个残障者自身真正的需求出发。特殊教育学校就是和主流的普通学校之间是完全隔离的,这样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残障者平等参与和融入社会的。”^②

知识的匮乏使得视障用户在许多需要技术操作的设备上“落空”,这也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视障人士的发展一直成为技术的“随从”。如何在教育水平上扩大对视障人群的包容,真正落实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的结合,满足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也是满足文明社会建构的基础条件之一。

三、如何解困:后信息时代的无障碍传播之思

《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规定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确保残疾人以正式公民的身份生活,能与健全人获得同等机会,机会包括享有健康、就业、

^① 访谈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

^② 访谈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

受教育和无障碍环境的权利,享有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权利等。文明社会的建成需要全社会对多元群体的包容,而媒介作为上传下达的“桥梁”,势必成为维系社会、生成观念的重要因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无障碍建设更加有利于残障群体,但如何在技术可及之后关注残障群体的内心需求,成为无障碍传播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立足点。

(一) 创新顶层设计,树立主体间性

新时代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从学界到业界都致力于为残障弱势群体贡献自身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制定显得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环境无障碍建设的措施上,还是信息无障碍的建设,政策制定者都应加强对残障群体的关照。目前的残障群体主要分归中国残联及其下辖机构管理,在残障者的口中有一句话是“残联就是残疾人的娘家”,但单一的上属机构使得残联与民政或其他机构常常在问题解决上缺乏明确界限,也就是说,残障者求助无门的情况经常发生,久而久之也就出现残疾人对管理组织的不信任。此外,政策设计上缺乏残障人士的参与,导致无障碍实施难触及痛点,这也主要与残障人士的受教育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单位,残障人士的缺席使得产品或措施的问世是以健全人的视角来考虑的,致使产品设计上欠缺对残疾人的关照,难以触及用户需求的痛点和难点。树立主体间性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基础,在平等的前提下,才没有居高临下的“他者”依恋,才能实现在文明的社会环境下真实共生。

例如,谷歌(Google)公司无障碍团队开发的一款产品 LOOKOUT,这个应用程序利用“手机相机+智能图像识别”的方式,实时告诉盲人用户身边有什么东西、辨识钞票面值、扫描条形码获取产品信息等。这款产品的开发受到盲人朋友的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谷歌无障碍团队里有很多自身是残障人士的工程师和项目经理,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对残障社区的深入理解以及扎实的技术和知识,能够精准地判断残障朋友的需求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有效的信息应用与传播应具备主体间性,即“你我之间”的互思,在互融互通的基础上充分借助科技弥合生理上的差距。

(二) “心灵盲道”:口述影像的未来展望

中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发展由上海市图书馆推出的首部无障碍电影《高考 1977》(2009)为标志,之后在政府和社会的联合下,无障碍电影逐渐为人熟知。从公益事业到国家产业,无障碍电影的发展道路逐渐成为造福无数残障人士的珍宝。尽管如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依旧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和发布上存在许多遗憾。目前无障碍电影的制作多数是由大学生志愿者来制作,而结果便是:无障碍电影的制作标准和影片版权成为发布过程中的“拦路虎”。在笔者的无障碍电影制作经历中,录制完成后的影片会提前交由几位视障朋友“阅听”,在不断的摸索中才发现无障碍电影制作的细小精髓。

将传统电影与无障碍电影巧妙融合,目的是利用无障碍来弥合本就存在于健全人与残障人之间的“沟渠”。一部成功的影片倚赖的是创作者的质素和阅听者的感悟,而口述影像的脚本和口述者充当起视障者理解影像讯息的重要中介^[10],然而脚本创作和质素培养需要专业的师资。在口述影像的人才教育方面,世界上第一所将无障碍传播这门课程纳入视听翻译课程体系中的高校是英国罗汉普顿大学开设的“无障碍传播”课程^[11],专注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也为无障碍传播的建设增添了人才宝库。同时,无论是视听翻译的人才培养还是设备软件的使用,毫无疑问资金的支持是战略保障。根据笔者的调查,绝大部分视听障碍者更愿意出门到电影院观赏电影,能够感受现场的电影氛围,在环境无障碍建设的基础上,如何建设便利的文化“通道”,对残障人士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三) 规避“数字残疾沟”:对特殊教育的思考

教育作为培养知识与智识的重要途径,成为社会交流的基础,特殊教育长久以来以区隔的方式在地区开展,且主要以应用教育为主。残障者与健全者的对话,在教育伊始就已分道扬镳。在教育平等的观念下开展对特殊群体的培养,成为未来教育现代化的出路。尤其是在技术社会的背景下,高科技设备为残障群体赋能,但技术使用的瓶颈依旧成为围困弱势群体的沟渠,国外学者在“数字鸿沟”的

基础上, 将残障群体在电子设备使用上的跨距定义为“数字残疾沟”。^[12]换言之, 视障等残障人士在社会上可能需要很多辅助技术来改善日常生活, 技术的进步则逐渐解决了存在的生理缺憾, 但教育水平的不足, 导致更多残障人士无法学习甚至接触技术, 这一“数字残疾沟”就会不断发育。“残疾沟”的出现, 也说明在技术“可及”之下无障碍传播显现出的“无奈”。如若不能很好地利用技术之便, 帮助残障人士跨越与健全人之间的沟渠, 科技反倒会成为另一道屏障。

如何跨越技术后的二次屏障, 研究认为, 在融合普通教学与特殊教育体系的基础上, 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残障者自身, 院校教育应该对残障者全面开放。另外, 普通学校应该成为对残障者开展教育的一个主力, 平等的招录与专业知识的支持, 为残障群体提供这种合理的便利。当然, 如果对于某些障碍程度特别重的学生, 如其自愿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的, 也可以在特殊教育学校里面就读。这种边界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将讨论的视角首先置于平等的语境中。2017年, 融合教育首次写进《残疾人教育条例》, 条例旨在办好特殊教育, 发展融合教育, 提高残疾人受教育的水平。而如何真正实现融合教育的发生、发展, 提升残障者高等知识水平的比例, 未来任重道远。

四、结 语

“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要看这个社会对待弱者的态度。”残疾人是新时代中国的一员, 在这个社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尊重和保障残障人士的选择权和尊严, 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新时代的成果, 是一个文明社会的重要表现。反观本文的研究, 笔者在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无障碍传播建设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对提升无障碍传播的效果提出几点解决之道。本文认为, 文明社会的建立是全民观念的集合, 在面对无障碍传播的未来发展中, 媒介在传播观念与无障碍建设上依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建设好媒介在无障碍社会中的关键地位, 聚焦真正的无障碍传播, 这是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该持续探索的。在技术合力的基础上, 汇集多方合作, 为实现真正和谐共生的文明社会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 [1] 李东晓, 熊梦琪. “可及”之后: 新媒体的无障碍传播研究与反思 [J]. 浙江学刊, 2017 (6): 199-206.
- [2] 李东晓, 潘祥辉. 无障碍传播: 历史、现状与理论框架 [J]. 中国传媒报告, 2011 (2): 96-105.
- [3] 赵美涵. 听障青少年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对策研究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 [4] Goggin, G. & Newell, C. (2003). *Digital disabilit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ability in new media*.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 [5] Moser, I. (2006). Disability and the promises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subjectivity and embodiment with an order of the norm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9 (3), 373-395.
- [6] 乐清市统计局. 2019年乐清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http://xxgk.yueqing.gov.cn/art/2020/3/26/art_1345559_42404360.html, 2020-3-26.
- [7] CNNIC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9590.htm, 2019-8-30.
- [8] 龚新琼. 关系·冲突·整合——理解媒介依赖理论的三个维度 [J]. 当代传播, 2011 (6): 28-30.
- [9] 马波. 浅议无障碍电影 [J]. 当代电视, 2016 (5): 110-111.
- [10] 赵雅丽. 视障学生对口述影像卡通影片理解机制之研究 [J]. 广播与电视, 2003 (21): 3.
- [11] 张娟, 熊兵. 视听翻译教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Jorge Diaz-Cintas 教授访谈 [J]. 上海翻译, 2018 (3): 89-93.
- [12] Sachdeva, N., Tuikka, A. M. Kimppa, K. K. & Suomi, R. (2015). Digital disability divide in information societ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 13 (3/4), 283-298.